

国外社会科学

著作提要

6

84



总第二十五辑

(情报学)

UOWAI SHEHUI KEXUE

ZHUZUOTIYAO

国外社会科学著作提要

第二十五辑 (1984年第6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

《国外社会科学著作提要》编辑部

(北京建内大街5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

编辑

出版发行

印刷

北京市门牌登记证第839号 内部发行 定价: 0.60元



国外社会科学 著作提要

第二十五辑 (情报学)

1984年第6辑₂

目 录

总 要

- (苏) B·A·维诺格拉多夫：情报与科学…………… (1)
- (美) J·绝曼：国家的生存：情报和社会研究者…………… (5)
- (苏) A·И·米海洛夫：情报环境的管理是科学活动的-一个条件…………… (7)

学科的基本理论问题

- (民主德国) H·格吕茨克等：关于情报学基本理论问题的争论…………… (10)
- (苏) Э·И·谢梅红克：现阶段的世界认识与信息科学…………… (14)

- (苏) А·И·米海洛夫等: 论情报学的发展前景… (16)
- (苏) В·С·卡札科夫采夫: 情报学的几个理论
问题…………… (18)
- (苏) В·И·西福罗夫: 信息科学及其课题…………… (20)
- (苏) В·С·米哈列维奇: 信息学改变社会生活的
面貌——科学扩大活动的范围…………… (21)
- (苏) А·П·叶尔绍夫: 关于信息学的对象…………… (22)
- (苏) В·И·西福罗夫: 信息学及其与哲学和其他
科学的相互作用…………… (24)
- (苏) Э·П·谢梅纽克: 如何理解“ИНФОРМАТИКА”?
(现状分析)…………… (26)

文献情报的加工

- (苏) В·М·帕斯图霍夫: 综述文献的一般概念… (28)
- (苏) З·托德列斯: 概述情报问题…………… (29)
- (印度) А·呼尔希德: 论文摘及文摘的编制…………… (31)
- (苏) А·В·舍尔绍娃: 研究文摘结构的问题…………… (33)

社会科学情报

- (苏) В·А·维诺格拉多夫: 社会科学情报的特
点…………… (35)
- (荷兰) Н·Р·豪盖韦格-德哈特: 社会科学, 社会
科学情报的特征及用户…………… (36)
- (匈) Т·弗尔迪: 社会科学情报与社会 实践…………… (38)
- (美) R·亚当: 使社会科学情报工作具有“社会
性”…………… (40)
- (民主德国) В·雷布林: 情报和文献在社会科学研究

过程集约化中的作用	(43)
(民主德国) E·舒尔茨: 社会科学情报和文献工作 · 分工与协作的几个问题	(44)
(美) 布利丹·J·布里顿: 社会科学界的国际联系 和情报传播问题	(46)

各国和国际组织的社会科学情报工作

H·A·瓦德纳: 联合国日内瓦图书馆的文献 活动	(47)
J·梅利艾特: 在社会科学情报和文献领域 ... 中开展欧洲合作的必要性和机会	(52)
(苏) M·P·加波奇卡: 国际社会科学情报系统 ...	(55)
(奥地利) M·比贝尔等: 奥地利社会科学 文献和情报	(61)
(比利时) Ph·劳伦特: 比利时社会科学情报和文献 概况	(64)
(保) S·加勃罗夫斯卡: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社会 科学情报系统	(71)
(加拿大) J·J·劳布塞: 加拿大社会科学情报和 文献工作	(80)
(捷) J·扎拉蒂尔: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科 学情报活动	(83)
(丹麦) M·达尔等: 丹麦社会科学情报和文献工 作的状况	(92)
(联邦德国) E·默赫曼等: 联邦德国社会科学文 献工作与情报	(100)
(芬兰) 奥伊利·科科宁: 芬兰社会科学情报与文	

献工作	(111)
(法) R·布律内: 法国社会科学情报和文献 工作	(119)
(民主德国) H·弗罗姆克内希特等: 民主德国社 会科学情报和文献系统	(131)
(匈) G·里札: 匈牙利社会科学情报和文献 工作概况	(138)
(意) P·比索尼奥: 意大利社会科学情报和文献工 作概述	(146)
(荷) H·P·赫格韦格德哈尔特: 荷兰社会科学文 献和情报	(150)
(挪威) K·T·萨莱等: 挪威的全国社会科学文献 和情报工作	(157)
(波兰) R·赫林斯基等: 波兰社会科学情报和文献 工作	(164)
(罗) M·约阿尼德: 罗马尼亚社会科学情报和文献 工作	(173)
(西班牙) I·卡纳尔斯: 西班牙社会科学情报和文 献工作	(183)
(瑞典) G·博曼: 瑞典社会科学情报和文献工作 ——议会图书馆	(194)
(瑞士) M·伯施等: 瑞士社会科学文献工作	(200)
(英) A·麦格雷戈: 联合王国社会科学情报和文 献的型式	(201)
(苏) B·A·维诺格拉多夫: 苏联社会科学情报服 务工作	(207)
(南) V·潘蒂奇: 南斯拉夫社会科学情报系统	(218)

总 类

(苏) B·A·维诺格拉多夫

情报与科学*

(苏联,《哲学问题》1983年第12期)

在社会情报中,科学情报占有特殊的位置。今天,科学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意义越来越大,科学情报的作用也随之迅速增长。而且这一情况在同样程度上既涉及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也涉及社会科学。

我们对待组织科学情报、对待计划和预测其发展的态度,应根据两个具有一般方法论性质的基本情况来确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奠基人的著作已强调了这两个情况的意义。我们说的是,第一,社会进程的加速,第二,这种过程的复杂化。

恩格斯指出,“在有机体发展的整个历史中,是应该承认加速同离开起点的时间距离的平方成正比的定律的”。^①这一论点在很大程度上对社会现象来说也是正确的,因为“以往的历史总是象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的规律的”。^②

生活充分证实了这一科学预见的准确性。可以作为左证的是: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在极短的历史期限内所发生的极其深刻的变化,殖民地国家及依附

* 这是《情报与当代全球问题》一文的最后一节。——译者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版第20卷第65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版第37卷第462页。

于帝国主义统治的国家的政治解放，全世界科技进步不断增长的速度以及当代的许多其他过程。因此，可以预计，社会变化的速度今后也会越来越快。而这种情况对现时科学情报的有效性及其现实性的要求也就越来越严格，因为这种情报是为认识迅速变化的现实和采取相应的政治、经济和其他决策所必需的。

恩格斯曾抱怨，由于情报迟缓不能获得如实反映不断发展并已发生变化的现实的图景。“对某一个时期的经济史的明确观念，决不能和事件本身同时得到，而只是在事后，即在搜集和鉴别了材料之后才能得到。在这里统计是必要的辅助手段，而统计总是落在事件的后头的。因此，在研究当前事件时，往往不得不把这个带有决定意义的因素看做是固定的，把有关时期开始时形成的经济状况看做是在整个时期内一成不变的，或者只考虑这个状况中那些从现有的明显事件中产生出来因而同样是十分明显的变化……不言而喻，这种对经济状况（所研究的一切过程的真正基础）中同时发生的种种变化的不可避免的忽略，一定要成为产生错误的源泉”。①

当然，今天也还远不能说，关于眼前发生的当代重大事件的科学情报落在事件后头的情况已经完全克服了。但是不能不看到，现代情报技术的发展至少可以使我们大大缩短情报落在事件后头的时间。重要的只是要适当地利用这种手段所提供的巨大可能性，以便使研究人员所需要的经验材料以最迅速和最有效的方式为研究人员所掌握，使研究成果以同样有效的方式成为科学及社会实践的财产。

社会实际情况日益纷繁，客观上难于对它们进行评述，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版第22卷第591—592页。

难于揭示出最重要的现象和趋势。于是，科学情报就成了科学分析与综合的极其重要的助手。科学情报的综合性是它的一个重要优点。因此借助科学情报可以对付科学研究专门化越来越细的客观趋势。在许多情况下这种专门化是必要的和正确的，但是它常常又会导致某些知识部门分科过细，有时还会造成课题零碎、研究的问题与社会实际的需要相距甚远的现象。需要努力提供有助于全面地，以足够的广度与深度阐明当代根本问题的多维情报。

这对研究大社会系统的发展问题尤为重要，因为研究这种问题需要查明许多复杂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从关系，要考虑社会历史过程的一般规律性和具体的民族特点以及其他方面的特点。马克思写道：“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这些变异和程度差别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所提供的事实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①

情报的综合性对研究处于几门科学接合点、需要采用跨学科方法的问题也是必要的。在这方面突出的有这样一些问题，诸如科技进步的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在解决各种各样问题（例如与生物学、医学、心理学的最新发现有关的伦理和道德问题，全球问题）时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合作与相互作用的途径和形式。

围绕主要的题目和课题集中开展情报活动必须进一步加深和扩大科学与科学情报之间的合作、相互作用和分工。没有科学情报系统的工作人员同科学研究人员、科学中心同科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版第25卷第892页。

学情报中心之间的积极和有效合作，就不可能充分阐明任何一个有理论和实践价值的重大问题。我们知道，科学是关于社会和用于社会的情报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来源，科学又是情报的一个主要用户。从这个方面来分析“科学—情报—科学”这一锁链的各环节的相互关系时必须注意到，情报的使命是储积、加工并以分类的形式和以某种程度综合的形式还原一切有社会意义的最重要资料，而决不仅仅是社会科学领域工作的成果。为了解决全球问题，必须保证有可能在最适宜的广度上采选与这些问题有关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所提供和利用的理论概念、研究方法和经验资料。

上述情况对情报过程的理论及工作方法提出了一系列迫切的问题。比如，在加强科学情报的综合性方面，十分重要的任务是实现情报在克服学科障碍、语言障碍和其他障碍方面的潜在能力。

在社会和政治过程蓬勃发展、科技进步空前迅速、严重的全球问题日益尖锐的我们这个世纪里，情报具有了史无前例的重要意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它促进社会管理效率的提高、科学和技术的高度发展、和谐发展的个性的培养。情报在两个世界社会体系的竞赛中起着巨大的作用。在这一竞赛中胜利属于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哪个社会体系能够在比对方越来越大的范围内生产对社会有益的情报并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所有领域以最有效和最适宜的方式利用情报。为在情报的生产与利用方面取得优先地位而斗争，是这个全球问题的重要方面。获得成绩的最重要前提是所有情报过程高度自动化。

妥善组织起来的全球情报能够扩大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

在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方面进行认真的、建设性的合作的可能性。以国际合作的利益为出发点的全球情报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其他全球问题方面取得进展。它将会促进先进社会发展经验广为传播。

社会经济情报领域国际合作的扩大并不能取消解决全球问题的不同观点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问题。但是，实践表明，现有的分歧对在解决人类沿着和平与进步道路发展的极端重要问题方面进行国际合作并不是不可克服的障碍。

(于 冥编译)

(美) J·鲍曼

国家的生存：情报和社会研究者

(美国,《图书馆杂志》1979年9月号)

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预测牵涉到许多变项。社会科学研究个体的人和人类团体。社会的未来却依靠人类本身、人们的思想以及随之产生的行动。

人类能够通过情报学到东西，这是别的动物所办不到的。如果我们聪明地运用这种能力，那么我们不但有可能生存下去，而且还能过高质量的生活。

1946年美国制订原子能法案时，芝加哥大学校长 R·赫金斯在国会作证时说道：这个问题是国会面临的最重要问题，比珍珠港调查更重要，它关系文明的前途。可以说委员会的考虑将决定文明是否能生存下去。另一位作证者是芝加哥大学人类学教授 R·雷德菲尔德。他说：也许因为战时，作为军用的原子能的发展没有请研究社会的科学家参加，但是长远这样不结合起来研究是不幸的。这些人早就想到情报、社会和人类三者之间的关系，要求为了人类的生存对原

子能的发展加以控制。他们建议的控制办法是在一个全球性的、错综复杂地结合起来的、社会中有计划地自由地交换情报。他们希望这种新型的关系能带来一个人类积极地共同联合起来的和平世界。在我们社会里，情报起着一种积极的作用。我们必须看到现在，2000年时以及2000年后情报对社会的形成所起的作用，它将指导社会，并且为人类的生存提供机会。

在人类历史上，情报是变化的动力。情报促使社会发生变化，这些社会变化又产生对新情报的需要。这样的连锁反应在过去社会中发生过，在未来社会中也同样会发生。

情报与变化的循环流程如下：（1）情报是行动的指针。（2）行动引起变化。（3）变化产生新问题，解决这些新问题，需要对它们进行集中的研究。（4）对问题的集中研究产生新的情报。这种情报与行动之间的循环流转就是现代社会的本质。

情报还常常涉及个人在作出决定或采取行动时进行挑选的问题，因为决定常常牵涉到如何根据情报进行挑选。有时由于缺乏有关情报，挑选的机会减少。DDT就是这样挑选出来的，现在出了问题。

我们将走向何处？在2000年时我们将有怎样一个社会？也许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要看我们是否为了明天的成就，今天就聪明地利用情报来决定事情。当我们走向2000年时，我们会不知不觉地遇到情报危机，就象能源危机那样。

在以投掷原子弹为其顶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曾暂时地把藏在图书馆中的情报看作是一种国家财产。在战争条件下，图书馆及其藏书内容成为国家安全、防务、卫生、经济自给自足、文化了解等等的主要物资。罗斯福总统

给书商联合会的那封信中就写道：“我们知道，在这次战争中，书籍就是武器”。当时的美国书籍中心负责人K·谢飞曾经这样说过，那时候，国会图书馆、国防部、战略情报局和许多其他政府机构都从敌后搜集情报。有的来自德国，有些则来自印度、中国以及其他远东战场。

当前美国的情况怎样呢？情报不被看作是国家应予关心的东西，而被非正式地交给无数图书馆分散地去做。公众的利益不能容忍对我们最宝贵的全国性资源（情报）的这种支离破碎的做法了。

光 军

（苏）А·И·米海洛夫

情报环境的管理是科学活动的一个条件

（《苏联科学院通报》1979年第9期）

现在科学情报问题空前尖锐。出版物的总量中科学文献的份量不断增长。尽管如此，科技出版物中研究者所需的科学情报却越来越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认真地充实“情报矿”，另一方面，在发表和处理科学情报时要加强情报过滤。

科学家在一定的情报环境中工作。情报过多使得这个环境恶化，不利于它的存在。所收到的情报总量大大超过了人的接受能力。情报环境与自然环境的状况很相似。在这两种环境中都产生了保护环境、合理安排环境的复杂综合问题。如果说对自然环境中困难的规模今天我们已能够相当清醒地作出估价，那么“情报生态”的困难时至今日还没有被意识到。以为采取纯组织措施，动用一些现代技术设备就可以解决科学情报的基本问题，这种错觉还没有消除。

任何一个情报部门都不比科学家本人更了解他的情报需求。但是科学情报方面的专家（情报学专家）更能理解情报环境的客观规律。研究和利用这些规律是他的本职工作。

发表的文章数量日增，人的接受能力却有限。因此有必要对情报进行压缩，于是派生出版物，首先是摘要出版物就广泛流行起来。派生出版物承担了科技革命前专业杂志的部分职能。现在一个科学家常常需要利用好几种派生出版物，因为他同时与几个狭小的专业界都有关系。派生出版物的任务不仅是压缩情报，而且还要对情报进行选择，对情报流加以过滤。可以试把压缩情报、选择情报的职能区分开来，从而加速情报环境的形成。这样就建立了一种特殊的情报出版物——信号情报刊物。为建立情报环境的各个片段，十分需要考察各个具体成果之间的联系，揭示新问题的实质及其与其他科学的关系。现在，概述出版物就起这种作用。概述出版物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情报出版物，这种出版物中定期发表关于处于热潮中的科学流派的专题概述文。概述文的作者往往都是深谙有关论著的著名学者。实际上在概述文中阐述的是摘要杂志中已介绍过的材料，但是这种材料组织得比摘要文章的简单汇集要好得多。在领导科学、技术、国民经济方面要作出决定的情报使用者十分需要高度综合的科学情报，全苏科技情报所和国内其他情报机构为他们共同编制年度分析报告，说明需要在国民经济中加以利用的科技成就。

情报服务方面取得的全部成就都是与科学情报理论有密切联系的。但是，目前科学情报还只是作为一个实际问题、作为科学活动所必需的条件得到承认。学者们深知，如果没有情报服务，科学是不可能存在的。“情报环境的管理问题是一个纯理论的学术问题”，这种认识显然是落后了。情报

学在苏联国内外都得到了一定的承认。现在全苏科技情报所面临的任务不仅有实践性的，而且也有理论性的：大力发展情报科学；研制总的方法和具体手段来分出情报环境的各个片段和确定各片段之间的逻辑联系；分析最有效地利用技术手段来改进情报服务的可能性。

计算技术的应用改变了苏联情报机构的整个系统。现在这个系统的基础是具有巨大资料库的大型科学情报加工中心。情报加工的结果不仅刊登在摘要杂志和信号情报刊物上，而且也制成磁带，这种磁带组成所谓机读资料库。这种资料库由机器进行加工：分类、标引、按每个中心所承担任务的特点进行整理。全苏科技情报所正在制定科技情报中心网络草案，这些情报中心使所有用户（不论属于哪个单位或位于哪个地区）都可利用分布在各个情报机构的科技情报。囊括各级情报机构的统一网络将成为管理科学和生产的重要杠杆。科学院将确定，本院哪些情报机构参加这个网络为宜。

现在苏联的自动化情报系统基本上只能进行原生情报资料的检索工作。使用这些原生情报资料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难题，解决的办法是复印和缩微复制。现在，情报服务的实践中缩微卡片利用得越来越广泛。利用缩微卡片原则上可以使科学院的每一个研究所都能有一套完整的学术文献。

赵国璋

学科的基本理论问题

(民主德国) H·格吕茨克、M·洛伊波尔特

关于情报学基本理论问题的争论*

(民主德国,《情报学》杂志1980年第1期)

H·格吕茨克:

民主德国的《情报学》杂志陆续刊登了一些文章,围绕着情报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展开了争论。这一讨论的主要问题只是这门科学的名称,而将弄清本学科科学活动的对象这一问题搁置起来。在讨论中施莫尔指出这门学科叫什么名字不是首要的问题,关键在于应就什么是情报学的对象问题统一认识。

如果读一下以前所发表的文章,那么就会使人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好象情报学失败的全部原因只是由于人们固执地把这一尚待科学地加以研究的实践领域的对象限制在科学情报的范围。

当然,以社会活动的某一部分为研究对象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如果不考虑它与周围事物的联系,那么这种研究只能是支离破碎的。因此,有必要将问题扩大到社会情报这一更广的范围来加以考察。

民主德国出版的《情报文献工作手册》的作者认为,

* 这是民主德国两位作者对前一段时期民主德国关于情报学基本理论问题争论的总结性评论。——译者

“情报文献科学的对象是情报文献工作所特有的全部领域”。但是该书的前言中所提到的情报工作却是指那些“与专业情报有关的”情报工作。这给人一种错觉，好象只有专业和科学工作领域里才有情报文献工作。

格罗斯、富克斯和基托维斯基支持关于扩大情报工作对象范围的主张。恩格尔贝尔特指出，在社会情报工作中存在着两大系统，或者说两种情报工作。一种是“大众情报”，另一种是“专业情报”。但是这种划分仍然没有超出科学情报的范围。这非常令人费解，为什么作者们在探索情报科学（他们用的就是这一名称）的规律时不愿意从全部社会情报工作的广度上着眼。众所周知，社会中有组织的情报活动的形式有着一定的共同的规律性。但是为什么非要把情报科学的对象限定在科学情报和专业情报的范围里，这一点谁也没有给予明确的回答。

“大众情报”活动也是以有组织的形式出现的。大众情报活动也有搞情报与文献两个工作阶段。谁也不想否认专业情报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但是任何人都不应该忽视大众情报活动对于社会发展同样具有重要性。不少具有大众情报活动特征的情报工作领域，如新闻学，也受到科学情报和专业情报的影响。

恩格尔贝尔特几年前提出，只有首先形成诸种“情报学”，然后才能建立某种统一的“情报学”。如果我们不仅把有关专业情报的学科，而且把诸如新闻学这样的一些学科也列为我们的研究对象，那将是十分有益的。

不少文章谈到，目前对情报文献科学的对象及其实践范围所作的定义是狭隘的。最好是扩大定义的范畴。就是说，情报文献活动不应只以专业情报和科学情报为对象，而且应